

## 城市化與移民教會的融入

### ——北京的固始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比較研究

袁浩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後研究員

伴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之後中國結構性變遷，基督教先後在中國農村與城市復興。<sup>1</sup>海內外學界對基督教與中國政治民主轉型的興趣較濃，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被忽略。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席捲中國大地的城市化，構成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內容。城市化與基督教的關係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進入二〇〇〇年，中國城市化與基督教研究開始為國內學者所關注。有學者較早、敏銳捕捉到城市化對中國基督教的衝擊，學者高師寧與段琦較多從宏觀視角呈現城市化與基督教互動的畫面。<sup>2</sup>以上學者為宗教社會學及當代中

- 
1. 參閱以下研究：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3)；Yang Fenggang, "Lost in the Market, Saved at McDonald'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in Urban Chin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4 (2005), pp. 423-441；Daniel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MA: John Wiley & Sons, 2012)；Chen-yang Kao (高晨揚),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Post Missionary Transformations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Ph.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June 2009)。
  2. 陳村富，〈城市化過程中的當代農村基督教〉，載氏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北京：東方，2005），頁 104-120。高師寧，〈城市化過程與中國基督教〉，載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網站（[http://christianityandchina.com/?page\\_id=373](http://christianityandchina.com/?page_id=373)，2016年5月9日瀏覽）。段琦，〈2011年中國基督教主要事件及城市化對教會的影響〉，載金澤、邱有輝主編：《中國宗教報告（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2），頁 64-104。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香港：道風書社，2012）。袁浩，〈聽不見的聲音：關於中國基督教城市民工教會的研究〉，載《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評論》39（2013），頁 337-353。

國基督教研究開拓出一條新路，但亦存不足之處：（一）城市化與基督教之間的單向度關係。現有研究對城市化之於基督教的形塑作用有探討；但基督教對城市化的回應與調適則是空白。就城市移民教會而言，（二）現有概念在中國處境是否需重新界定？如移民、移民教會。本文以北京市兩類移民教會為研究對象，探討移民教會與城市化間的關聯性，重點探討移民教會如何調整自身的神學、組織及制度，以適應、融入城市生活。

## 一、研究設計

### 1. 重要概念及理論

筆者首先對本文核心概念及理論進行闡釋。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有：城市化、移民、移民教會；所用理論是美國社會學家安默曼 (Nancy T. Ammerman) 堂會研究的理論框架。

#### 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在城市經濟日益繁榮、組織增加，以及交通網絡逐漸普及的處境下，人口不斷遷移到城市生活的過程。<sup>3</sup>城市化不僅指涉經濟、社會與人口的變遷，也指涉一種生活方式與文化的改變。<sup>4</sup>城市化基本內涵有：城市經濟發展、產業多元，吸引農村人口大量湧往城市就業；城市面積不斷擴大，吸納農村地區；城市化意味着一種城市文化與生活方式。較之於歐美及拉美國家的城市化，當代中國城市化有其特殊一面：中國通過戶籍制度，以制度性方

---

3. John Friedmann, *The Prospect of C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 3-4; Gino Germani,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Studies on Its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1), pp. 52-54.

4. Joe Feagin, *The New Urban Paradig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C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式將城市與農村分開。該制度阻礙城市化進展，以及人口自由流動。<sup>5</sup>以此來理解當代北京的城市化：

第一，急劇增長的城市人口。北京市其人口增長主要途徑是移民，其中從外省農村遷入該市的移民佔較大比重。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截至二〇一〇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 1,961.2 萬，較之於十年前增加 604.3 萬人。<sup>6</sup>同時來自外省農村的流動人口大約 500 萬，佔全市人口 25% 左右。

第二，持續擴大的城區面積。在市場經濟與國家推動下，北京市城市化進展較快，城區面積年均增加 30 平方千米，城市面積從一九八一年 346 平方千米，增加到 2005 年 1,209 平方千米，進而增加至目前 1,400 平方千米。隨城市化推進，城中村、周邊農村或城鄉結合部相繼拆遷，被整合到城市中。

第三，多樣性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外來人口從中國各省份湧入北京市，多樣性文化傳統開始形成，從傳統至現代呈現一個連續體。外省鄉村移民在北京市生成以地緣與血緣為聯繫紐帶的各省族群共同體，如「河南村」、「安徽村」及「浙江村」，<sup>7</sup>其內部仍然維持家鄉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急速城市化及大規模城市拆遷與重建衝擊各省族群共同體，使之趨於解體；傳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因缺少空間支持而備受衝擊，有些開始向現代過渡。

第四，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戶口制度是國家對人口進行社會控制的制度性安排。該制度使得外來人口無法取

- 
5. 夏建中，《城市社會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38-39。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頁 38-44。李強主編，《中國社會變遷 30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90-135。
  6. 北京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北京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http://www.bjstats.gov.cn/tjsj/tjgb/rpqb/201511/t20151124\\_327785.html](http://www.bjstats.gov.cn/tjsj/tjgb/rpqb/201511/t20151124_327785.html)，2016 年 5 月 3 日瀏覽）。
  7. 蘇黛瑞著，王春光、單麗卿譯，《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農村流動人口、國家與市場邏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頁 276-279。

得城市戶口，失去相應的公民身份，從而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基本的公民權利、社會權利與都無法保障。外來人口中的農村人成為城市中的「邊緣人」。<sup>8</sup>

### 移民與流動人口

蘇黛瑞是研究中國城市化及人口遷移的重要學者。她認為，基於公民身份，流動人口在於他們在漂泊中流動，現在及將來都沒有可能成為永久的定居群體。而通過其他方式，如升學、參軍等進入城市、獲得戶口（即公民身份）的是移民。「流動」對應的是流動人口這一群體，「遷移」對應的是移民這一群體。<sup>9</sup>

但蘇黛瑞的研究及概念分類是基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初的中國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已然發生、且正在發生巨大的社會變遷，蘇黛瑞的概念分類是否需要重新檢驗？首先，戶口制度在國家政策層面開始呈現根本性變革。<sup>10</sup>其次，城市流動人口內部已存在很大的社會分化，其中部分人群積累較多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積極融入城市。他們在戶口政策鬆動的城市已獲得當地戶口與公民身份，從而實現流動人口到移民的轉化。<sup>11</sup>在當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與移民的界限逐漸模糊，流動人口向移民的轉化是一個社會事實。

本文認為流動人口及移民之間，概念內涵的差異在縮

8. 黃劍波，〈中國城鎮民工的宗教生活〉，載《二十一世紀》19（2008），頁104。

9. 蘇黛瑞，〈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頁15。

10. 二〇一四年七月中國政府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中國全面放開建制鎮及小城市的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的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的落戶條件。這意味着實施半個多世紀的戶口制度即將退出歷史舞台。《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建議〉》（<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30/c70731-25369521.html>，2014年7月30日瀏覽）。

11. 二〇一二年六月訪談東五旗聚會點劉女士與遺傳道，他們稱教會中部分信徒已搬遷到北京郊區縣市，或者毗鄰北京的河北縣市。他們在當地購置房產，且獲得當地戶口。

小。依據現有政策甚至可以樂觀預測，國家正致力於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故筆者將使用移民這一概念。此外，蘇黛瑞認為沒有界定流動人口，本質在於是否具有本地戶口。無法獲得戶口的就是流動人口。然而這一界定在當下中國並不適宜，因為中國城市有部分大學生、白領亦無法很快獲得當地戶口，然這個群體無法歸入流動人口之列，成為移民較為合適。

### 移民教會

何謂移民教會？本研究認為，主要由移民所構成的教會即為移民教會。移民教會作為一種教會類型，不僅在於會眾群體的構成，還在於移民群體背後所指涉的地方文化。據筆者二〇一一至二〇一四年北京市移民教會田野調查，依照會眾籍貫分類，北京市有兩類規模較大的移民教會：河南固始人教會與浙江溫州人教會。這兩類移民教會之所以構成教會類型：（一）教會或聚會點數量、信徒人數眾多，形成一定規模；（二）教會有其不同的文化歸屬，有其清晰的邊界與身份認同。

與歐美發達國家移民教會相比，北京移民教會有何特徵？拉美有些國家在城市化中，五旬節基督教在貧民區廣泛傳播。教會為會眾提供技術培訓，以及信徒之間的互相支持。教會產生的社會資本幫助移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sup>12</sup>美國有研究表明，城市移民教會有着服務俱樂部的功能，在生活工作諸多方面幫助移民融入當地生活，但這種服務的提供往往局限在特定的族群教會。<sup>13</sup>

---

12.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 Blackwell, 1990).

13. David Ley, "The Immigrant Church as an Urban Service Hub", *Urban Studies* 45.10 (2008), pp. 2057-2074.

## 安默曼及其堂會研究的理論

建基於社會組織及堂會研究，美國社會學家安默曼從三個維度審視基督教的堂會生活：資源、權威結構（structure of authority）與文化。安默曼認為，文化包含實體的構成、活動的類型、建立這些客觀事物的語言與故事。堂會環境的變遷，意味着堂會資源的變遷；理解堂會對環境變遷之反應的關鍵是，留意堂會達至各種類型資源的途徑與方式。而堂會內外的權力與影響力，扮演形塑堂會的功能。<sup>14</sup>本文將權威結構細化為制度與治理方式，用資源、制度與治理方式及文化作為分析框架來審視移民教會。對變遷中的當代中國移民教會而言，制度與治理方式是一個更為突出的影響因素。第一，資源。教會得以運作所需的物質資源與人力資源，如宗教活動場所、經濟能力、會眾的人數與質素，以及專業的神職人員等。第二，制度與治理方式。教會是否有成文的規章制度，以及教會的治理權力如何分配。第三，文化。會眾在信仰實踐當中所體現出的文化類型。

## 2. 研究方法

本文之所以選擇北京市移民教會：（一）最近二十年北京市城市化進展顯著。對包括教會在內的社會組織而言，城市化構成一個重要的外在環境。此外，在高速城市化與現代化發展背後，充分暴露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特徵，呈現出文化類型的變遷與差異。（二）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來移民教會在北京市發展較為迅速，形成相當規模的、不同省籍的移民群體。

本研究所指涉北京移民教會，依照籍貫分兩類：固始

---

14. Nancy T. Ammerman, *Congregation and Commun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7-62.

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固始是河南省信陽市一個縣，溫州是浙江省一個市。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將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加之城市與農村的戶口制度開始鬆動，因此農村人口有制度性機會向城市流動。固始縣是農業大縣，其產業以農業為主，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農村剩餘勞動力日漸增多，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固始人開始向大城市流動。溫州是一個山多地少地區，人均耕地少，因此農村人口不得不外出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一九九〇年以來，固始人與溫州人在北京市各自形成一個人數龐大的群體。

從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三年間，筆者進入北京市田野，使用滾雪球的方式參與觀察河南固始人教會十一間，浙江溫州人教會七間；訪談教會領袖、普通信徒三十人次，形成三十萬字的訪談資料。訪談設計採取半結構與結構性問題相結合的方式。

## 二、北京移民教會

### 1. 移民教會的興起

北京市移民教會興起於二十世紀九〇年代。<sup>15</sup>中國城市化推動大量外省農村人口湧入北京市，尤以河南、河北、溫州農村人口為多。<sup>16</sup>農村基督徒亦被這個移民運動所席捲而遷入城市。來自河南、溫州的基督徒，依靠血緣、地緣的社會關係網絡，組織建立屬於自己群體的教會——固始人教會、溫州人教會。

---

15. 同時期興起的還有城市新興教會。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北京基督教以建制教會為主。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北京市基督教發展呈固始人教會、溫州人教會、建制教會與城市新興教會為主的多元格局。

16. 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辦公室，《北京常住外來人口來源地分析》（[http://www.bjstats.gov.cn/rkpc\\_6/pcsj/201107/t20110704\\_205615.htm](http://www.bjstats.gov.cn/rkpc_6/pcsj/201107/t20110704_205615.htm)，2016年5月3日瀏覽）。

固始縣是河南省農業大縣。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剩餘勞動力開始向城鎮流動。目前固始縣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其中多達七十多萬人外出。而九〇年代以來基督教在固始出現大復興，尤其農村地區，有的是整個村歸信基督教。隨着九〇年代城市化推動，固始基督徒隨人口流動開始遷移到城市。固始人在北京市形成自己的聚居區，一般稱「河南村」。依託於固始人工作與生活的區域，固始基督徒亦成立自己的教會。

溫州有中國「耶路撒冷」及中國「猶太人」之稱，前者說明基督教在溫州的復興。<sup>17</sup>後者指出溫州人有經商的非凡稟賦，在經濟上開創了聞名全國的「溫州模式」。<sup>18</sup>正是溫州獨特的宗教與經濟身份，塑造中國基督教面貌，形成遍布各城市的溫州人教會。當城市中的溫州基督徒越來越多聚集，地區主義色彩濃厚的溫州基督徒無法融合本地教會。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以來大量以溫州人為主的查經班、聚會點，乃至教會建立起來。

## 2. 移民教會的增長

### 會眾增加

城市化與市場經濟源源不斷吸引農村人口（包括農村基督徒）進入城市，為移民教會新成員的補充及再生產提供基礎。現有研究及田野調查表明，移民教會新成員的增加及教會快速增長，並非開展城市宣教的結果，而是將散落在城市中的固始人基督徒、溫州人基督徒聚合起來。<sup>19</sup>

---

17. 陳村富、林道順，〈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中國各宗教的走向〉，載陳村富編，《宗教文化》第三輯（北京：東方，1998）。

18. 李雲河、鄭子耿，〈溫州模式〉，載周爾鑾、張雨林編，《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94-129。

19. 劉琪、黃劍波，《都市邊緣的民工教會》（香港：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據袁傳道統計，東五旗教會信眾百分之八十來自河南固始縣，民工群體歸信者較少。



### 固始人教會：組織的裂變與複製

城市化帶來大規模城市拆遷，客觀上促成固始人教會的裂變與擴張。面對拆遷，教會將會眾分為若干區域小組。宗教精英參與區域小組，再吸收該區域附近的新成員，一段時間之後新教會得以建立。橄欖教會即以組織裂變與複製的方式實現教會增長，至今有二十五個聚會點，會眾達兩千人。對此橄欖教會柳牧師說：

城市拆遷對教會發展是攔阻也是機遇。攔阻是給教會帶來衝擊、損失以及人數的失落；機遇是帶來發展。奶西教會、北湖教會與東五旗教會都是仰山拆遷後建立的，沙河教會也與仰山拆遷有關係。<sup>20</sup>

### 溫州人教會：從巨型教會（Mega Church）到分散聚會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北京市「浙江村」人口大部分是溫州人。「浙江村」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生活、生產、經濟交易及教育都在社區內完成。<sup>21</sup>為滿足溫州基督徒的信仰需求，溫州人教會開始在「浙江村」建立。進入二〇〇〇年北京市政府開始對「浙江村」進行大規模拆除，及至今日「浙江村」不復存在。溫州人與溫州基督徒隨之分散到其他城區，而溫州人教會也隨之搬遷。位於「浙江村」的大紅門教會曾經維持規模龐大聚會，二〇〇八年主日崇拜有兩千人。二〇〇九年大紅門地區拆遷，大紅門教會搬出城中村大院，一個巨型教會分成十幾個聚會點，分散在市內各區。分佈於不同城區的聚會點開始吸納

20. 訪談橄欖教會柳牧師（2012年8月22日，北京）。

21. 「浙江村」研究請參閱王春光，《社會流動與社會建構：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項飏，《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聯書店，2000）。

附近的溫州人基督徒，教會信徒及教會數量實現增長。

### 3. 移民教會的研究個案

固始人教會：以橄欖教會為例

橄欖教會於一九九九年由河南農村傳道人開創。教會發展迅速，現有二十五個聚會點，會眾近兩千人。橄欖教會下屬的定廠聚會點、東五旗聚會點及佳名聚會點基本情況如下：

	東五旗聚會點	定廠聚會點	佳名聚會點
成立時間	2004	2002	2009
同工	全職牧師 1 位 義務同工 10 多位	全職傳道 1 位 義務同工 12 位	全職傳道 1 位 義務同工 2 位
教會位置	城郊農村， 租賃大院	城中村， 一堂在社區， 一堂在臨時飯店	城郊社區
會眾人數	180-210	100-120	20-30
會眾職業	廢品回收	廢品回收	多元
會眾籍貫	以河南固始縣為主	以河南固始縣為主	本地人
小組團契	9	4	無
治理制度	傳道輪換制 傳道主導型	傳道輪換制 傳道主導型	傳道輪換制 傳道主導型
	橄欖牧區中的最大教會	教會搬遷八九次之多。教會進入社區樓房遭遇失敗，新一輪轉型進行中。	社區教會

信眾：城市邊緣人。城市中的固始人基督徒一般從事工時長、收入低的低端職業，居住條件差，沒有城市戶口，無法取得「市民」身分，不被主流社會認同，難以建立對北京市以及教會的歸屬感。固始人群體成為城市中的「邊緣人」。邊緣人的身份不僅體現在經濟地位，更體現於文化意義。如帕克（Robert Ezra Park）所言，「邊緣人」生活在兩種不同且對立的社會與文化的邊緣。<sup>22</sup>固始基督徒「邊緣人」的身份，使其很難融入城市現代生活，亦很難適應傳統鄉村生活。

同工制度。橄欖牧區實施「輪換制」，傳道人約三至四年輪換一次，調動悉由牧師決定。「輪換制」近似「主教制」下的神職人員調派。以定廠教會為例，傳道人之下是同工，約十二人，另尚有預備同工，構成教會核心。同工並非由會眾選出，由傳道人從會友中挑選有心志及教育水準相對較高者擔任。但固始人教會的同工並未形成參與教政的實體，只扮演「協助者」角色。

治理制度。教會組織化、制度化程度較低。人數較多、規模較大的教會，其內部的團契、小組等組織很少；現有的組織，其功能、角色等不清晰。教會沒有成文的規章制度，運作依靠領袖層。從教會議事可見一斑。即使開會也沒有明確的會議紀錄制度，而是由牧師記下來。同工之間互相提醒。除了教會的會議缺乏成文的紀錄外，日常的運作不是根據明確的制度，而是「慣例」比較多。

### 溫州人教會

大紅門教會、安提阿教會與三一教會基本信息如下：

---

22. Robert Ezra Park, *Cultural Conflicts and the Marginal Man*, 引自 Everett Stonequist, *The Marginal Man: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Conflic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7), p. 15。

	大紅門教會	安提阿教會	三一教會
成立時間	1993	1993	2006 從大紅門教會獨立
同工	全職傳道 1 位 帶職同工 40 多位	全職傳道十幾位 執事副執事 14 位	牧師 2 位 帶職同工十幾位
教會位置	商貿中心：國際窗簾布藝城	寫字樓、城郊廢舊工廠等	寫字樓
會眾人數	2000-3000	3000	兩堂崇拜：一堂普通話約 150 人，一堂溫州話，二三十人；
會眾職業	企業老闆、 小店主為主	企業老闆、 小店主為主	多元
會眾籍貫	溫州 C 市	溫州人為主	多元
聚會點或 小組團契	十幾個聚會點	50 多個聚會點	十多個小組與 團契
治理制度	派單制、總會主導型	前期派單制；現是教會議事會負責，7 個事工部門，14 位執事、副執事；聚會點有全職傳道負責	制度化
	典型的溫州人教會	轉型中的溫州人教會	去溫州化，教會建制（成為規章制度、信仰告白等）完成轉型；

會眾：「抱團」與生意人。溫州人內聚力強的文化特徵，影響了他們在教會的參與角色。「抱團」是溫州人的特性，意即喜歡結成一伙，聚集時說「溫州話」，形成「溫州人」圈子。不論是做生意，或教會生活等，都是這圈子的分支。

溫州人教會其會眾另一個特點是其商人背景。他們留在北京是因為「商機」，反之亦然。信徒的高流動性，不僅難以牧養，也影響其對教會的委身及參與。溫州基督徒也將商業活動視作生活的中心，形成時間分配上與教會生活的矛盾。楊牧師曾經為溫州信徒開辦小組，但只維持一兩個月，便因各人忙於打理生意而停止。不僅信徒如此，甚至同工亦然。

治理。溫州人教會組織化與制度化水平亦較低。傳統溫州人教會其總會掌握治理權威，傳道人並不固定在堂會，而是被總會差派。改革中的溫州人教會則開始淡化這些特點。而去溫州化的教會則全面拋棄溫州人教會特徵。

### 三、移民教會的變與不變

當代北京城市化進程，給固始人教會帶來衝擊、挑戰及形塑，表現在以下方面：

#### 1. 教會資源層面

##### 活動場所

固始人教會及其宗教場所的流動性。城市中的不同類型教會，其宗教活動場的類型亦不同。三自教會使用公開的教堂，場所具有穩定性；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租賃居民樓或寫字樓單位，有少數教會購置寫字樓單位。與三自教會與新興城市家庭教會不同的是，屬於移民教會的固始人教會租用城郊、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的平房、大院、倉庫及廢舊工廠。北京市大規模城市化，城鄉結合部、城中村經歷拆遷改建而消失在城市視野中。這意味着宗教活動場所在地裏版圖上開始重構。分佈於上述區域的固始人教會，其聚會場所也在拆遷之列。定廠教會自二〇〇五年經歷六、七次搬遷。平房、倉庫、飯館，甚至公園都曾是聚會

場所。宗教活動場所的頻繁更換，使得固始人教會成為一個流動的信仰共同體，教會沒有穩定的空間進行內部建造。

溫州人教會及其宗教場所的相對穩定性。與固始人教會不同的是，溫州基督徒多從事商業，經濟收入較高，教會有能力租賃寫字樓，宗教活動場所相對穩定。市場經濟及城市化帶來城市不同區域的功能分化，不同功能的商業區與分工逐漸形成。作為溫州人聚居區的「浙江村」被拆遷之後，溫州人向北京市內擴散，在不同商業區建立教會。如大紅門服裝商業區、日壇皮毛外貿商業區、南四環中路的窗簾商業區。為方便溫州人基督徒參與教會活動，溫州人教會一般都建立在商業區。

### 會眾

固始人基督徒的流動性。固始人教會隨城市拆遷節奏而流失信徒、吸引新成員，加之民工基督徒沒有穩定的職業，因此會眾流動性較大。固始基督徒處在一種流動中，拆遷不停，流動不止。如此情境，信眾對教會事務參與較少，教會亦較難進行事工長期規劃。

溫州人基督徒流動性更高，但城市化並非主因，而在其商業文化背景，以及這種商業文化對信徒教會觀的形塑。首先，商機變化決定他們是否留在一個城市。其次，信徒受商業文化影響而產生一種消費主義心態，視教會為信仰的供給方，而會眾是消費方，此種文化下信徒很難委身教會。

## 2. 教會制度

中國農村基督教組織化、制度化水準較低，是一種徹底的復原主義。<sup>23</sup>固始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都承傳農村基督

23.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 147-153。

教運作方式：（一）沒有成文規章制度；（二）教會運作主要依靠慣例、經驗以及牧師或傳道人的推動。然而這種治理方式受到城市化與城市生活的衝擊與挑戰。具體而言：教會規模的擴大，城市社會發達的組織及組織的制度化與科層化，教會年青人對教會權威的挑戰。

第一，城市化推動移民教會規模急劇擴大。移民教會中的大型教會，其聚會點多達三四十個，人數有兩三千人之多。正如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指出的，宗教組織規模的擴大，促使教會正式規範的增加與角色日益專門化。<sup>24</sup>

第二，城市社會理性化與科層化組織為移民教會制度變遷提供典範。改革開發以來中國城市社會正發生一場廣泛的社團革命。<sup>25</sup>社會組織制度化與科層化發展到一個相當的水準，這種城市圖景對移民教會中的宗教精英影響較大。因為較之於會眾，宗教精英社會交往較多，與社會關係較為密切。與其他類型教會相比，新興教會制度化走在前列，<sup>26</sup>對移民教會的制度變遷起到推動的作用。推動作用之所以實現，得益於城市跨教會組織網路的建立。二〇〇七年建立北京市教牧聯禱會，這個跨教會網絡逐漸擴大，移民教會的宗教精英也參加其中。可以說新興教會直接挑戰移民教會治理模式，同時為其提供了一個典範。

第三，年青會眾對教會權威的挑戰。持續不斷的城市化為移民教會增加新成員。進入二〇〇〇年之後，移民教會新成員多以年青人為主，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受傳統束縛較輕，更加融入城市生活。他們對權威的認可不同於

---

24. 約翰斯通著，袁亞愚、鐘玉英譯，《社會中的宗教：一種宗教社會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頁78-80。

25. 何建宇、王紹光，〈中國式的社團革命——對社團全景圖的定量描述〉，載高丙中、袁瑞軍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61。

26. 何哲，《城市中的靈宮——一個知識分子及其家庭教會的發展實錄》（香港：明風，2009），頁139-143。

以前。筆者曾參與某教會青年團契的活動，觀察到年青一代對教會現狀是不滿意的，他們渴望更多的機會參與教會，並能改變教會的某些運作方式。他們為此會與教會主要負責人分享，當建議不被接納，有些年青同工甚至離開教會，這無形中推動了教會制度的改變。

與固始人教會不同的是，溫州人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加之地區主義的族群特徵，溫州人建構了一個封閉與排他性的社群。在社群內部建立起自己自足的生活、經濟與信仰體系，相對獨立於城市社會。溫州人教會亦置身於這樣一個社區。在教會制度層面，不似固始人教會，城市化與城市生活對溫州人教會制度層面的衝擊較小。據我們的田野調查，北京溫州人教會唯一的變革力量，來自少數具有革新精神的教會領袖。這個群體往往人數較少。

### 3. 教會文化層面

移民教會的文化特點體現在三方面。第一，基要主義。田野調查中發現，兩類移民教會其講道信息主要涉及人與上帝的關係，絕少涉及社會與政治議題，是典型的基要主義信仰。第二，靈恩信仰。移民教會承接中國農村基督教特點，在個人信仰及宣教中以趕鬼治病為特色。而靈恩色彩較濃的宣教方式在城市基督教當中則沒有那麼大的市場。第三，私人宗教。移民教會信仰呈現出一種私人宗教的特徵。對教會使命，宗教領袖並沒有提出一個清晰共識，僅僅是維持教會運作。信徒的信仰實踐無法跨越私人領域的邊界而走向公共。

移民教會的基要主義、靈恩信仰以及私人宗教的文化特徵，受到城市化與城市生活的挑戰。城市化是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城市中現代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挑戰移民教會的文化類



型。如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在《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 中所說，現代社會是一種世俗文化，這種世俗文化具有韋伯所言的祛魅性，趕鬼治病等靈恩色彩的信仰模式在世俗化的城市當中市場較小。而城市基督徒更傾向理性與知識的信仰模式，加爾文神學的流行、城市基督徒書店及基督教書籍的傳播就是明證。<sup>27</sup>城市的快速變遷以及城市化，促使宗教領袖去關注國家與社會時事新聞，並非僅僅關注信仰共同體之內。而城市生活中發達的信息傳媒與網絡，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教會會眾當中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較為富裕的群體，使得他們有更加寬廣的視野而更多關注社會。

相對於固始人教會，城市化對北京溫州人教會最大的影響，是對其教會文化中的特殊主義、地區主義之衝擊。溫州人教會具有濃厚的地區主義特徵。溫州人內聚力強的文化特徵，「抱團」是於溫州人的特性，聚集時說「溫州話」，形成「溫州人」圈子。三一教會揚牧師，形容這種「封閉」現象，「是關起門來做教會」。城市化帶來大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雖然溫州人仍可維持溫州人的小圈子，但無可避免的接觸其他省份、不同職業的人群。教會會眾的構成開始趨向多元，但非溫州籍的信徒在教會當中仍是邊緣性的存在，而教會組成尤其是教會同工仍以溫州基督徒為主體。

#### 四、移民教會對城市化的適應

如上所言，北京市城市化給移民教會帶來諸種挑戰。教會領袖是否認識到？是否推動教會改革以回應之？田野調查發現，固始人教會部分領袖清醒看到這些問題與挑戰，並着手推動教會改革，以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

27.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來城市基督教發展的一個特徵是不同類型基督教組織的興起，包括文字出版、社會服務等。

## 1. 固始人教會轉型

橄欖教會負責人普遍認為，隨城市化與城市拆遷，作為城市邊緣人的固始人群體終將消失，而固始人教會亦會消失。二〇〇七年橄欖教會即提出教會轉型，教會轉型就是將同質性較強的固始人教會，轉型成為一個包括固始人在內的、多樣性的本地教會。而橄欖教會轉型核心問題是教會應否或如何由固始人教會轉向本地教會。

模式一：從平房教會到樓房教會。聚會場所從平房直接搬入樓房。然而教會若干次轉型都以失敗告終。主要挑戰是：第一，聚會對鄰舍有滋擾，被投訴之後在壓力下被迫離開。第二，固始人基督徒很難適應社區文化，以及樓房教會的敬拜模式。「有很強的拘束感，甚至講道人都感覺壓力蠻大。房子一塵不染，進來要脫鞋，手紙不能亂丟，他們感到拘束、不自由，缺乏聖靈的工作。後來租平房聚會，他們就覺得適應、舒服。」<sup>28</sup>

正在進行轉型的教會——定廠聚會點。改革第一步是將教會堂址從平房區遷移到城市居民區的樓房。搬遷到樓房：第一，可避免堂址不斷變遷，為教會發展與轉型創造一個穩定空間。第二，可發展社區的福音工作，從而吸納本地居民參與教會。元傳道是改革的支持者與推動者，他的願景就是要建立以當地白領、學生、社區居民為基礎的本地教會。教會在轉型當中，需繼續觀察。

模式二：從社區小組到社區教會，以佳名聚會點為例。東五旗聚會點有少部分信徒是附近名佳花園居民。二〇〇九年柳牧師決定發展社區教會：第一，在佳名花園租賃民居作聚會點。第二，邀請佳名花園的基督徒參加本社區聚會。第三，與社區居委會建立良好關係。社區教會模式取

---

28. 訪談橄欖教會柳牧師（2012年8月22日，北京）。

得一定成效，三四年下來佳名聚會點信徒發展到三四十人。教會鼓勵信徒服務社區，比如清潔衛生、節假日送禮物等，與本社區居民及居委會建立良好關係，為社區傳福音工作贏得很大空間。佳名聚會點建立主要依靠本社區基督徒的參與，緩解教會與社區有可能出現的緊張關係，而且不會出現文化差異與適應的問題。

模式三：購買樓房、建立母會。柳牧師對橄欖教會未來發展這樣看：籌款建堂，作為母會，以服務分會。他計畫在全教會籌款購買一處房產，作為母會。母會可作為聚會場所，還可作為神學培訓中心。柳牧師的計畫在討論階段遇到部分傳道人反對。反對者認為，籌款建堂風險太大，或許導致政教關係緊張；城市房價高，會眾經濟實力有限；即使購買，只能購買面積較小的房子，作為聚會場所以及神學培訓中心都不實用。

## 2. 制度化治理

就城市化及城市生活給教會治理帶來的挑戰，袁傳道認為制度化對未來教會發展是很重要的，甚至影響教會延續性。為此橄欖牧區嘗試改變教會運作的家長制作風，開始下放權力給教會或教會傳道人。不僅傳道，教會中少數信徒亦認為規章制度對於教會的重要，如信徒魏所言：

很想教會有很好的制度，沒有制度就沒有方圓。每樣事情都必須有制度性，都是有分寸的，不是亂七八糟的。比如，就作見證我們給弟兄姊妹說：你們要登記，向傳道人或是服侍的同工說一聲。以前沒有這個制度，大家就嘩嘩的都起來。<sup>29</sup>

---

29. 訪談定廠聚會點魏弟兄（2012年5月5日，北京）。

固然固始人教會制度化水準較低，同時我們也發現較為積極的一面。

第一，教會提供的公共生活有助培育規則精神與公共意識。橄欖教會同工每月都有培訓，參加人數超過一百人，教會負責午飯。而中午大家在大院子一起進餐。二〇一一年六月份筆者曾參加培訓大會。午間仔細觀察一百多人吃飯情景：會不會如在農村一樣秩序很亂？讓人吃驚的是，一百多人自覺排成兩個隊伍，大家比較安靜的端着餐盤等待飯食同工為他們加餐。與農村公共秩序的情境相比，民工基督徒在這樣的公共空間卻演變出城市的生活方式。

第二，教會領袖培養民工基督徒的規則意識。定廠聚會點主日崇拜結束有信徒做見證。做見證環節最開始時，願意做見證的信徒們都站起來，走到前面去。其中一個尚且沒有講完見證，另一位插話，秩序較混亂。而且作見證的信徒大多說着家鄉話。就此情景，袁傳道制定報名的規則——做見證的信徒要提前一週報名，而且要將見證內容準備好，免得到時不知說甚麼或者說兩分鐘就沒有內容。最後，作見證要儘可能使用普通話，讓更多人理解。自實施報名制度，信徒開始學習使用普通話、學習報名以及尊重秩序。

### 3. 溫州人教會：本地化的可能

按前文所述，城市化為城市帶來大量的外來人口，而他們具有不同的語言、地方文化與生活方式。這是溫州人教會必須面對的社會與文化處境，是繼續抱團、維持教會是溫州人的教會，還是接納不同人群參與教會？是依照地方特色建立獨立的本地教會，抑或仍舊維持與母會的統屬關係？據田野調查，面對城市化對溫州人教會帶來的衝擊，大多數北京溫州人教會仍維持原有架構、制度、牧養，

看到教會問題且願意改革的教會領袖較少。有少數年青教牧人員認為教會必須轉型，實現當地化。方案有二：第一，在溫州人的獨特基礎上改革；第二，淡化教會的溫州色彩。持第二類意見者認為，在北京堅持以溫州人族群來界定教會身分，已不可為，教會要在北京有生存空間，就必須「去溫州化」，吸納更多不同背景的信徒。相反，持第一類意見者，認為「去溫州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特色，放棄溫州傳統，不再是溫州人教會。他們認為，教會應維持溫州人作基礎，進行轉型，這個才得上是有意義的改革。

大紅門教會：作為第一類轉型的教會，大紅門教會在二〇〇〇年開始在崇拜中推動說普通話。此舉旨在讓非溫州人能夠投入聚會。不過，由於信眾絕大部分來自溫州樂清，即或願意在聚會時使用普通話，仍難以吸引其他群眾背景的信徒。相反，許多信徒（特別是長者）非常不習慣使用普通話。現時在大紅門教會正式普通話聚會結束後，信徒私下聊天都用溫州話。我們曾參加其同工聚餐，十多位同工在過程主要以溫州話溝通，這使得非溫州籍貫的信徒無所適從。

安提阿教會：轉型中的溫州人教會。教會於一九九二年，最近幾年教會推動轉型，治理權力從總會下放到各堂會。總會有七個執事負責，分別負責教會不同的事工。執事由聚會點同工選舉產生。各聚會點設置專職傳道人，不再實行巡迴制度。教會建立神學培訓班，注意培養教會年青同工，並吸納河北、河南等非溫州籍信徒加入同工行列。

三一教會：較為成功的去溫州化。原屬大紅門教會的楊牧師在轉型問題上有不同的立場。他認為，溫州人教會在各方面延續溫州的傳統及模式，完全沒有融入北京。由於不滿這種「封閉」性，故決定推動改革。不過，他的見解受溫州

母會及北京教會保守派反對。於是他決定脫離大紅門系統，在二〇〇六年成立一個獨立教會——三一教會。聚會初期仍以溫州人為主，但他堅持本地化異象。最後三一教會的成功，其實是讓堅持溫州色彩者離開，其中也包若干同工。現時非溫州人已佔教會信徒結構的主體。就楊牧師所知，三一教會是北京溫州人教會唯一成功轉型的教會。

## 五、總結及討論

### 1. 總結

作為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城市化，推動中國鄉村人口向城市移民。而鄉村基督徒也捲入這一個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之中，遷入城市。由於移民教會對城市文化及宗教生活的不適應，他們尋找屬於自己的宗教生活。建立在血緣、地緣等原初共同體基礎上的移民教會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於城市中崛起。

依照會眾信徒的籍貫分類，北京市移民教會主要有兩大類，固始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這兩類教會的興起原因、治理模式、教會權威分配，以及群體的文化類型等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同時也存在差異。雖然固始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都是傳統社會的構成部分，然而溫州人教會更多受商業文化及市場經濟的形塑，同時對地方文化的認同更加強烈。

席捲中國的城市化推動人口在全國範圍內的流動，移民教會也因此在城市中興起。為學界所忽略是，城市化本身對城市中的移民教會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一方面，北京市城市化給移民教會的擴展與增長提供一種驅動力，使得移民教會在十多年間迅速發展為規模龐大的教會。另一方面，城市化為城市中的移民教會帶來也帶來嚴重挑戰。這種挑戰體現在移民教會在宗教活動場所的頻繁變動、會

眾群體的流動性、教會制度建設沒有穩定的空間，以及教會傳統的信仰文化需要轉型，及適應城市生活。概括起來就是，移民教會何去何從面對維持原有傳統，還是本地化的方向選擇。

在本研究的個案研究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溫州人教會與固始人教會，其不同的文化脈絡、族群特徵及經濟資本，決定了各自變遷的方向與命運。溫州人教會，其內部較強的、排他性的地方認同，使其較難推進本地化的改革，較難融入城市。然而同時溫州人教會豐富的社會及經濟資本亦為這個群體轉型提供了較之於固始人教會更多的客觀教會。不同於溫州人教會的是，固始人教會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並不排斥其他社會群體，且更容易接受教會改革。然而固始人教會在職業及經濟收入處於城市社會底層，這使得他們很難融入城市，亦較難發展本地化教會。

## 2. 討論：原初共同體邁向公民共同體？

本研究關注：城市中的移民教會是否依然維持傳統社會的某些特徵？抑或開始邁向現代社會的公民共同體？

作為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共同體。帕森斯提出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五個特徵，其中一組模型是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sup>30</sup>沃納（Stephen Warner）認為：在其發展方向上，堂會更傾向一種特殊主義而非普遍主義。<sup>31</sup>當代移民教會的生成與維持，很大程度依賴血緣與地緣的社

---

30.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Abingdon: Routledge, 1991), pp. 182-198。帕森斯認為，特殊主義是人情，乃是小群社會的特徵。在親戚、朋友、同事、同鄉間，互相呼應，甚至可以不顧正義公平而遷就人情。普遍主義是按照規章制度辦事的特徵。

31. Stephen Warner, "The Place of the Congreg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ligious Configuration", in James P. Wind & James W. Lewis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ongregations, Vol. 2 of American Congreg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63.

會網絡。整體而言，移民教會維持傳統社會特徵，是一種特殊主義的共同體。或如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說的「共同體」，而非「社會」。<sup>32</sup>面對快速的城市化，這種宗教共同體是否一成不變？是否有可能發展成為擁有現代性與公共性的公民共同體？<sup>33</sup>

北京市城市化給橄欖牧區帶來很大衝擊、挑戰，並形塑固始人教會。面對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有改革意識的宗教精英推動固始人教會革新：嘗試將宗教活動場所搬遷至城市社區，發展城市社區的成員；嘗試將教會管理制度化，並分散教會權威的治理權力；突破單一靈恩色彩的信仰實踐。固始人教會轉型、適應城市生活的這一嘗試中，我們看到：

第一，教會革新與轉型的方向。城市化進程中的固始人教會，無法繼續維持傳統社會的特徵，城市現代生活與文化在形塑固始人教會的文化類型，這首先表現在部分宗教精英融入城市生活的願意甚為強烈，是宗教精英帶領教會走向一種現代的與公共的方向。

第二，特殊主義共同體中孕育着積極因素。包括部分會眾及宗教領袖對制度化有初步的認識及推進，固始人教會提供一個公共空間，便於會眾培育參與精神與規則意識。靈恩色彩的信仰不再佔據壟斷地位，理性信仰與反思開始在會眾中興起。不僅僅關注共同體內的事務，部分會眾開始有更大的關懷，包括對其他群體福祉的關懷以及對社會的關注。這些都是宗教共同體邁向現代性與公共性，建構公民共同體的跡象。

32. 滕尼斯著，林榮遠譯，《共同體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傳統社會的組織類型，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的群體如家庭、宗族裏實現，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及宗教共同體是作為共同體的基本形式。國內也有學者翻譯為「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

33. 普特南著，王列、賴海榕譯，《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公民共同體強調參與、合作的精神，以及寬容、團結及信任的品質。



即使如此，固始人教會面對極大挑戰，建構公民共同體並不樂觀。第一，固始人基督徒受教育程度較低，以及低層次的職業，在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都較為短缺。第二，北京市處於急速城市化導致宗教活動場所及會眾都處於流動狀態，難有穩定空間進行教會建造及轉型。第三，國家戶口制度形成對民工基督徒的排斥，他們很難融入城市。因此，固始人教會成為城市中流動的、暫時的與分化的信仰共同體。

溫州人教會與固始人教會相似性較多，如制度化水平低，傳道人主導型的教會治理，信徒參與的意識及能力也不理想。可以說，兩類教會所建構的共同體，距離公民共同體的距離相對遙遠。兩者也有差異之處：溫州人教會承接溫州濃厚的地域主義色彩，基督徒群體較為封閉，難以接受其他身份的群體。而溫州商業文化也影響教會的運作，使得基督徒以一種消費者的心態來參與教會事務。固始人教會，雖然基督徒群體多是河南人，但相對開放，沒有溫州教會封閉的文化特徵。溫州人教會優勢在於：教會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本以及良好政教關係，這使得他們具有較穩定及和諧的空間來建造教會，為向公民共同體的轉變創造條件。相反，雖然同樣受制於國家歧視性的戶口政治，但溫州人教會領袖在北京經商、買房，較易融合在這個城市。如果教會方面能在組織制度及神學傳統上有所更新，推動教會轉型，其往公民共同體轉化的可能也較大。

**關鍵詞：**中國城市化 移民教會 公民共同體

作者電郵地址：[yuanhao@cuhk.edu.hk](mailto:yuanhao@cuhk.edu.hk)

中文書目

- 何哲。《城市中的靈宮——一個知識分子及其家庭教會的發展實錄》。香港：明風，2009。[HE Zhe. *Spiritual Palace in Urban China: A Life History of an Intellectual Christian and His Church*. Hong Kong: Ming Feng Press, 2009]
- 李強編。《中國社會變遷 30 年，1978-2008》。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LI, Qiang, ed.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1978-2000*.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8.]
- 李雲河、鄭子耿。〈溫州模式〉。載周爾鑾、張雨林編。《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94-129。[LI, Yunhe & ZHENG Zigeng. “Wenzhou mo shi”. In *Zhongguo cheng xiang xie tiao fa zhan yan jiu*. Edited by ZHOU Erlu & ZHANG Yuli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4-129.]
- 段琦。〈2011 年中國基督教主要事件及城市化對教會的影響〉。載《中國宗教報告（2012）》。金澤、邱永輝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64-104。[DUAN, Qi, “2011 Zhongguo ji du jiao zhu yao shi jian ji Cheng shi hua dui jiao hui de ying xiang”. In *Annual Report on Religions in China (2012)*, edited by JIN Ze and QIU Yonghu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2. pp. 64-104.]
- 約翰斯通。《社會中的宗教：一種宗教社會學》。袁亞愚、鍾玉英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Johnstone, Ronald L. *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Translated by YUAN Yayu & ZHONG Yuying.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夏建中。《城市社會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XIA, Jianzhong. *Urban Sociology*.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袁浩。〈聽不見的聲音：關於中國基督教城市民工教會的研究〉。載《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評論》39 (2013)。頁 337-353。[YUAN. Hao, “Unheard Voices: Study on the Migrant Workers Church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39 (2013). pp. 337-353.]

-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LEUNG Ka-lun. *Rural Churches of Mainland China since 1978*.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1999.]
- 普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王列、賴海榕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Putnam, Robert E.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Translated by WANG Lie & LAI Hairong.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2001.]
- 黃劍波。〈中國城鎮民工的宗教生活〉。載《二十一世紀》19（2008）。頁 104-110。[HUANG, Jianbo. "Zhong guo cheng zhen min gong de zong jiao sheng huo". *Twenty First Century* 19(2008). pp. 104-110]
- 。《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香港：道風書社，2012。[HUANG, Jianbo, *Country Churches in Cities: Urban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12.]
- 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Tönnies, Ferdinand.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ranslated by LIN Rongyu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劉琪、黃劍波。《都市邊緣的民工教會》。香港：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LIU, Qi & HUANG Jianbo. *Du shi bian yuan de min gong jiao hui*. Hong Kong: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 蘇黛瑞。《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農村流動人口、國家與市場邏輯》。王春光、單麗卿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Solinger, Dorothy J.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Translated by WANG Chunguang & SHAN liqing.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外文書目

- Ammerman, Nancy T. *Congregation and Communit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Feagin, Joe. *The New Urban Paradig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C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 Friedmann, John. *The Prospect of C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 Germani, Gino.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Studies on Its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1.
- Martin, David.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 Blackwell, 1990.
- Ley, David. "The Immigrant Church as an Urban Service Hub". *Urban Studies* 45.10 (2008). pp. 2057-2074.
- Parsons, Talcott. *The Social System*. Abingdon: Routledge, 1991.
- Solinger, Dorothy.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Marke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Stonequist, Everett. *The Marginal Man: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Conflic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7.
- Warner, Stephen. "The Place of the Congreg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ligious Configuration". In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ongregations, Vol. 2 of American Congregations*. Edited by James P. Wind & James W. Lew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54-99.

#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Urban Inclusion of Immigrant Church:

## A Comparison of Gushi Church and Wenzhou Church

YUAN Hao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immigrant churches in the urba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ince 1990s, the rapid urbanization of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hinese Christianity.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urbanization, immigrant churches began to transform in the following aspect: the churches reformed its system, authority structure, organization and even its theological tradition. The researcher adopts case study as the primary method. Based on the 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ional observation at Gushi church and Wenzhou church in Beij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hurches' inclus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because of different factors, the immigrant churches showed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me of them have successfully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faith community to a modern civic community, while some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find their way out.

**Keywords:** Chinese Urbanization; Immigrant Church,  
Civic Community